



## 山坡上的红胭脂

□文/图 迟玉红



### 花事

童年里美好的记忆穿过花枝，我听到每朵花都发出“咯咯”的笑声。连带着我笔下的文字也迈着优雅的步伐，在方格里欢快地舞蹈。

少时，每逢暑假，我经常跟随父母上山干活，总能遇见红红的山丹丹花在田野里怒放。风一吹，它们摆弄着细软的腰肢，为大自然送上最美的微笑。我时常采几朵插在小辫上，还刮下蕊心里红红的花粉当胭脂，往脸上轻轻一擦，或涂在指甲上，把小手染得红彤彤的。现在想起此事，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，我还是那个捧着山丹丹花、在田野里嬉戏的女孩。

随着知识的积累，我知晓那曾被当作胭脂的山丹丹花，在陕北地区被誉为“希望之花”。从那时起，山野间与它再相逢，思绪便不仅仅流连于那抹艳红的花蕊，耳畔会不由自主地响起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这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。尤其是那句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，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”，字字铿锵，让我备感振奋。

为了遇见山丹丹花开，我等了三年。计划前年写它，当我来到三十多年前那个山丹丹花开放的地方，四周却没有寻到它的影子。我现在有点后悔，当年若是我没有挖走它的球茎，说不定这里会长出一大片山丹丹花。去年秋天，我跟老家在山区的文友说，如果他的亲友看到山丹丹花开，请给我拍几张照片。

山里人很忙碌，但文友的邻居依旧热心地拍了一个视频。这是一株在贫瘠的石缝中绽放的山丹丹花，我数了数，开了八九朵花。它眉飞色舞地摇曳在山风中，我甚至能听见草丛里的虫儿在吟唱、林间的飞鸟在欢歌。瞬间，我的脑海中浮出一个美好的画面：蓝天下一群群的羊儿在跟白云赛跑，头裹着白羊肚手巾的农人们在田野里，热火朝天地收割庄稼。有一天，我准备写作时，却发现不知何时把视频清理了，只好搁笔，再等一年。

今年9月初，文史员王同海老师发到群里一张山丹丹花的照片，再次勾起了我写它的欲望。王老师是我们当地的历史专家，他看到这株花开得正美，就忍不住发到文化调研员群里。青州邵庄镇与齐国故都临淄毗邻，这里有悠久厚重的齐文化历史。当我知道它生长在这里的山上时，顿时觉得它不再是一株普通的花，它的每条脉络都流淌着文化气息。

群里有人说这是彼岸花，我赶忙纠正，说这是山丹丹花，顺带提起了自己那桩未了的心愿。王老师看到我对山丹丹花饶有兴趣，便相约隔日带我去山上看看。那天早上，山林间的鸟鸣，一声接一声地落在我的车窗上，伴随遍野的花香，我们往山上驶去。

我一直以为相遇美好，不是你在等我，也不是我在等你，而是在某一个时刻，彼此恰好

撞见了，便定格为最美的瞬间。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傻？为了一朵花，竟然不顾一切地从城北跑到西南山区，只是为了亲自去看一看它。看它花开的模样，看它与我相视的姿势，看它与风儿私语的娇憨。

到了山脚下，晨阳缓缓地对对面的山峰间露出半张红红的脸庞，娇羞地望着我。在松柏林间，我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山丹丹花。可能来得有点早，那些花苞有的半开着，或许还在打瞌睡；有的还紧闭着嫩红的小嘴，或许还在做着美梦，真担心我们的脚步声，打扰了它们的宁静。但也有早醒的，绽开美丽的花瓣，向我频频招手。

或许，唯有真正走进大自然中，用指尖去触摸每一寸草木，才能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蓬勃气息。我的呼吸与林间的清风、草叶的颤动、花瓣的吐纳已渐渐相融。哪怕我闭上眼睛，也能感觉到它们含情脉脉地望着我。此时此刻，无需刻意寻觅，所有的幸福都不请自来，我再次成了被大自然宠溺的孩子。

这片山坡大约在十步范围之内，生长了六七棵山丹丹花。王老师与文友每找到一棵，就像孩子一样开心地大喊。我蹲在花儿旁，托着相机，寻找着最美的画面。哪怕是一片枯萎的花瓣挂在花茎上，我也觉得这是爱意浓浓的深情风景。在杂枝乱石中，一株山丹丹花长得很高，需仰靠着草地才能拍全它，从上部的花骨朵到下部的果实，我数着它曾经开过十六朵花。

“山丹丹长一年，多开一朵花。你看，十三朵。”“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。”当年汪曾祺老先生在大青山遇见了生长了十三年的山丹丹，而我遇见的这株山丹丹，已在此生长了十六年。我忽然想问它会不会寂寞，后来一想，它与花鸟为伴，与清风共舞，与雨露同饮，还看着山下村庄“破茧成蝶”，这样的日子怎能寂寞？

不得不承认，我是带着私心而来，想挖一棵移栽到家里。这样我就能看着它一年复一年地多开一朵花，看着它陪我慢慢地变老。王老师却跟我商量，劝我不要挖走这棵十六年的山丹丹花，让它在原地过自己的生活。他说：“如果有一天你想起它，就年年来看望它，说不定它能陪伴你好几个十六年。你想想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！”

与花儿相伴，本身就是世间最幸福的事。仅仅是一朵花的绽放，我便忘却了所有的烦恼，卸下了所谓的矜持，在彼此含笑的眸光里，足以温柔余生漫长岁月。

## 高崖观音阁与明楼

□张希良

一个地方能成古镇，或因交通商贸繁盛，或因名人辈出。昌乐老家邻村高崖便是这样的所在。那时，村里多是茅草房，高崖却耸立着青砖高楼。

常听大人们讲起明楼的传说，我却一时误将带大拱门的古建筑——观音阁，当成了传说中的明楼。后来父亲为我解惑：“真正的明楼，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占了。八路军用‘四一式’山炮把它轰塌，才赶走了敌人。那门立功的山炮，当年就架在咱家老屋的土墙上。那时，咱们已搬到崖头上的新屋了。”

父亲说的这一点，我还有点记忆，因为家里种的菜园，正是老屋的地基。村里人常提起当年在此架炮打鬼子的往事。我问父亲：“为啥叫明楼？许是明朝建的吧？”父亲对此不甚了解。我又问：“高崖那个带大拱门的建筑呢？”父亲答：“那是个阁子。”“阁子是啥？”我继续问。父亲坦言：“我也不清楚，大伙儿都这么叫。”

但当地能弄清观音阁和明楼关系的人，确实不多。父亲在村里已算有些见识，有些文化。这也怨不得知晓的人少，阁子实在朴素得近乎寒酸，几乎找不到任何表明它身份的痕迹，只在后墙的青砖里，嵌了一块不大的青石，刻着“观音阁”三字，再无其他证明。

如今，我已年过半百，平日也常写点东西，但对观音阁的认知，长久以来也只停留在“一座古建筑”上。前些日子为写一篇文章，得知现存的观音阁也曾历经战火，便特意回老家深挖。在经历一番探寻后得知，这座未曾谋面、毁于战火的明楼，与眼前这座饱经风霜的观音阁，竟是同一家族在不同时期建造的姊妹之作。

这段营建史，始于明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。高崖村出了一位读书人——监生秦东周。他在村中德高望重，遂与族人商议，主持筹建观音阁。然而工程进行期间，秦东周忽然接到任命，前往山西省襄陵县任职，修建之事一度搁置。直到明万历十五年（1587年），秦东周卸任归乡，才又与他的两个儿子秦登云、秦登龙合力续建，终使观音阁巍然矗立。父子三人，皆为读书人，皆有官职。

在秦东周归乡之前，他的二儿子秦登龙早已入朝为官。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，秦登龙在村中建造了一座高楼，作为私人宅邸。当时，秦登龙在京城鸿胪寺任职。他在高崖街所建的这座气势不凡的高楼，便是日后闻名遐迩的高崖明楼，比观音阁早一年建成。明楼屹立300余年，最终毁于战火。因为历经战火，许多人误以为明楼是一座炮楼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在高崖是最高建筑，甚至高于四周的城墙，由于它的坚固，也起到了防御作用。

明朝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秦登龙再次回乡，主持修建了离明楼不远的观音阁。时光流转至清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年），秦氏后人秦尔谦（据记载为秦登龙后代，具体世系已难详考）又率众对观音阁进行了大规模重修。

前些年，村民见观音阁屋顶漏水、黑瓦破碎，使用水泥及红砖、红瓦进行了修补，未能“修旧如旧”，使得古阁形制混杂，颇显不伦不类之态。原本，观音阁北面紧邻高崖东西大街，站在古街仰望，阁楼气势宏伟，威武雄壮，历经这些年变迁，只留下孤零零的观音阁。从后边看，它甚至已被土埋了半截，宏伟的石拱门也失了往日气象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抗日战争烽火燃起，明楼不幸被日军占据，成了日伪军的指挥所和坚固的军事堡垒。在惨烈的高崖战役中，鲁中军区八路军以“四一式”山炮将其轰塌，彻底拔除了这一日伪据点。据传，这门山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。

我写下这段文字时，想到祖屋的土墙曾为山炮提供过依托，心中更是感慨万千。如今，观音阁依然矗立在村中，阅尽村庄数百年沧桑。而那曾经巍峨的明楼，连同那段铁血交织的烽火岁月和家族的荣光往事，已化作尘封的历史与珍贵的记忆，透过祖辈的口耳相传，以及博物馆里静默的展品，悠悠流传至今。